

Enter the Era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Collected Papers on Foreign Art Studies

走出编译时代

——外国美术研究论文集

近代以来，中国美术史是在空前

激烈、空前范围的中外文化碰撞中展开的。在这个历史中，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包括历史、理论和批评的研究，始终扮演着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是从翻译和介绍开始，并与之并行发展的。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的参与就不会有中国美术目前的面貌，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恢宏的格局和多样化的形态。



走出编译时代

——外国美术研究论文集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编译时代:外国美术研究论文集/《美术观察》杂志社,
山东艺术学院编.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102-05969-3

I. ①走… II. ①美… ②山… III. ①美术评论—外
国—文集 IV. ①J0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150号

走出编译时代

——外国美术研究论文集

编辑出版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
网 址 www.renmei.com.cn
电 话 发行部: 65252847 65256181 购邮部: 65255981
责任编辑 刘士忠 张 舒
封面设计 胡白珂
责任校对 常志英 魏雅娟
责任印制 文燕军
制 版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2年7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9.75

印数: 0001-2000

ISBN 978-7-102-05969-3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目录

序：面向未来的思想姿态

——《全国外国美术研究与教学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	1
全国外国美术研究与教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开幕词	5

外国美术研究的战略目标和学术立场

当前外国美术史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9
走出编译状态——当代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	13
外国美术史研究的新时期与新出发点	18
集思广益，开创外国美术研究及教学新局面	
——我对首届“全国外国美术研究及教学发展战略研讨会”的期待	21
重新写作艺术史——在中国建设世界艺术博物馆的基本思路	26
从一元论到多元主义——关于美术史研究的中心论	33
“繁荣”的背后——对中国的外国美术史研究现状的思考	38
艺术史是一种权力——“走出编译时代”	43
外国美术译介、研究与教学谈	46
漫谈西方美术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	49
被忽略的现场	54
化西为中与人文精神——西方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	57
他山之石攻我之玉——对于外国美术研究的战略思考	63
多元民族性与世界美术研究——漫议外国美术、美术史研究的学术立场	68

外国美术翻译、研究的方法

多多关注外国美术研究

——在“全国外国美术研究与教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	79
边缘的思	83
《图像学研究》译者序	88
历史的反思与修正——19世纪后期的学院派绘画与前卫思潮	96
历史主义、“艺术史科学”和“美术通史”	106
女性主义对美术史解读的新突破——琳达·诺克林美术史研究试析	112
美术史书写中的缺席者	117
让桑吉奈（红棕素描）作为术语引入中国画坛	121

文杜里的艺术批评观及其意义·····	126
艺术与偏见——如何对待历史中与现实中的“前卫艺术”·····	139
以两种视角解读四幅作品——两种艺术史写作观的比较·····	143

外国美术史教学和专业建设

一门不该被边缘化的课程·····	153
建立世界美术史的学科体系·····	159
艺术史教学中的“相对主义”策略——关于艺术史教学实践的一点浅见·····	163
关于外国美术史教学方法的一些想法·····	167
略论西方美术史教材的撰写体系与范式的“难题”·····	174
西方美术史教学中的“技术性介绍”·····	183
国内高校《外国美术史》教材建设之我见·····	186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外国美术史?·····	189
以“绘图笔记作业”等“史—论—实践”教学法巧授美术史课·····	192
新形势下外国美术史公共课教学的几点思考·····	197
对外国美术史教学的思考·····	201
外国美术史教学过程讨论·····	206

外国美术专题研究

《天使传报》与西方绘画传统·····	217
战争、灾难与回忆——林璎《越战老兵纪念碑》的启示·····	231
浅议中国的日本美术史研究·····	241
宫廷绘画的叛逆者——朱塞佩·阿尔钦博托艺术探究·····	245
夏加尔绘画中的犹太情结·····	250
古典主义艺术的典范——论列宾美术学院的传统美术教学·····	253
基督教绘画的神性静观与绘画个性生成·····	259
思想的肉体显现——解读西方现代艺术中的人体·····	267
列宾与斯塔索夫：意味深长的艺术寓言·····	271
塞尚——永远的名字	
纪念塞尚逝世100周年·····	286
试论塞尚对艺术与自然关系的全新阐释·····	290
法国象征主义艺术运动的衰落期·····	295

序：面向未来的思想姿态 ——《全国外国美术研究与教学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

吕品田

2006年11月18日至19日，《美术观察》杂志社和山东艺术学院在济南共同主办“全国外国美术研究与教学发展战略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外国美术研究领域的八十余名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文艺研究》、《美术报》、《大众日报》以及山东电视台、山东教育电视台等数十家全国和地方媒体参加了本次会议。这是中国首次举行的外国美术研究领域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也是立意深刻、取向远大的专业学术研讨会。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人因此一定程度地了解了外国美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这些成果中，西方的、通史性的和介绍性质的较多，东方的、“亚非拉”的、国别史和研究性质的较少，总体学术格局尚未走出编译状态，教学和学科建设尚未摆脱苏联模式，学术判断和选择也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痕迹。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宏观发展目标都在发生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迫切需要在价值追求、思想立场、学术格局、研究方法以及结合社会需求、促动美术繁荣等方面做出与时俱进的战略调整，并就教学实践和学科建设进行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为此，会议拟定了“21世纪中国之外国美术研究的战略目标和学术立场”、“外国美术研究方法”和“外国美术史教学和学科建设”三个针对性的议题，希望汇合全国专业领域的精英力量，集思广益，谋求共识，共同推动中国之外国美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会议的主题和议题得到了全国外国美术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会议预先收到论文近50篇。为时两天的会议开得紧凑而有序，专家学者围绕议题以提交会议论文、专题发言、即兴发言和自由讨论等多种形式参与研讨。如张敢在论文中所言：“学术研究虽然是自由的、无党性的，但它应当服从于民族发展的利益，美术史家应该负有一种历史使命感，而不是自身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从态度认真、气氛热烈的会议现场，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外国美术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们的敬业精神、责任感和对事业前景的乐观、自信。研讨会分三场进行，从总体情况看，三个议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展开，也呈现出不同观点主张间的思想张力。

“21世纪中国之外国美术研究的战略目标和学术立场”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在致辞中，表达了大家在大原则、大目标上的趋同意见，他说：会议所期望的虽是很高的要求，但从大的和长远的角度来说是需要。会上，专家学者就此议题所发表的突出观点有以下方面：

1. 主张“从一元论到多元论，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上海大学教授潘耀昌认为“从一元论到多元论”是一种话语权与生存权的争夺，虽然它仍是西方思维的结果，但迎合了我们时代的、民族独立时代的需要，适应了国际政治、文化的民主化趋势。尽管摆脱西方话语权并非轻而易举，但我们治史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立场和眼光，要考虑建立中国的学术体系。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龙圣明等很多专家学者都强调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但大家并不认为这就要另立一个“东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丕宇认为，以某一“中心论”的思想来建构艺术史都是不恰当的，需要体现立足民族性的世界性。讨论中有学者指出了“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和“以西方为中心”含义上的根本不同，即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余丁所言“在立自己的标准之前要去了解别人”，所谓“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不等于不尊重研究对象。

2. 主张“走出编译状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镛、王端廷，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等都明确提出这个主张。黄河清结合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材料提出“艺术史是一种权力”的观点，强调“走出”就是不丧失我们的文化自主权，不丧失我们的文化艺术价值标准，不在艺术史写作上做可怜的应声虫，并认为有了“走出编译状态”的意识，表明艺术史论界终于有了争取文化自主权的觉醒。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杨振国对“编译”价值的强调，表达了大家对编译工作作为外国美术研究基础之重要性的共识——要“走出”的是一种止于编译的“工作状态”，而不是要放弃编译工作。邵大箴所强调的“重点还是要做好介绍和普及工作”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展鹏所强调的“研究外国美术要有自己的筛选，有自己的看法”，从两个侧面表达了对“走出编译状态”之战略目标的完整认识。

3. 主张“重新写作艺术史”。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认为要用“一种自觉的、诚意的”“中国眼光”来重写艺术史。他把“中国眼光”落实为两点：在中国艺术传统中形成的观念；受到西方文化刺激和影响后重看世界的方法。虽然这种内涵冲突性的“中国眼光”最终会造成怎样一种战略导向尚有深究的余地，但“重新写作艺术史”的主张却可以从战略目标意义上解答“能不能走出编译状态？走出去能再干什么？”的疑问。

4. 主张不要忽略国际艺术实践的现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俞可认为，中国学者需要改变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要在“现场”，这不仅可以帮助了解国外艺术发展的真实情况，更可借此使中国的文化立场和相应的成果反作用于整个世界艺术的发展。显然，这是一个涉及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中国学者体现中国自身立场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

应该在“现场”，而且还应该以之在国际范围创造具有前沿性、前瞻性的“现场”。

当然，如余丁的置疑——“我们的当代艺术史是否受到西方权力的影响”，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意见，即不认为西方学者有人为干预的倾向或者不必把这种问题作太严重的强调。这种意见中包含了对中国学者保持平和、从容认知心态的有益提示，因为干不干预的问题是与我们的主观愿望无关、我们也无法左右别人的态度与立场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是否一定要把别人的识见看得那么重要、那么神圣、那么至高无上。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邵亦扬指出，以往的一些外国美术研究“太有自主权”，以致造成很多误区，她批评了以政治意志代替学术判断的“权力干预”。尽管这个问题的范畴与“西方话语权”问题不同，但学术研究的确应该杜绝这种“自主权”。会上有专家学者提出了应该形成“全球意识”，应该改“外国美术史”为“世界美术史”的很好的意见。真正体现中国人全球眼光以至取向世界格局的研究，当然应该是“世界美术史”这样的概念，当然应该有宏大的学术架构，今天，中国人确实应该做放眼全球的世界美术史了。当然，针对国内教学的介绍和研究，或许叫“外国美术史”有其明了性。从根本意义上说，有没有“全球意识”不在于概念或名称有多大，关键是眼光要高，胸怀要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宝林用缘自蔡元培和鲁迅之表率的启发性的“二思”，提示了中国学人面向战略发展应该具有的两种主体姿态：为人生而治学，这可以联系到张敢的观点即“应当服从于民族发展的利益”；既要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世界意识，又要有鲜明、坚定的民族主体立场。

以在美术史研究领域有成就的西方学者的学术实践为个案，展开外国美术研究方法问题的研讨，可谓本次研讨会的一道突出景观。这其中包括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对帕诺夫斯基批判性地“探讨视觉结构与观念范畴之间的对应性，从而捍卫了文化的整体性”的图像学方法的提示和探讨；包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建群、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马晓琳对诺克林努力突破美术史定论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或价值取向的提示和探讨；包括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常宁生对20世纪后期艺术史研究一个新的辅助性方法——修正主义的提示和探讨；包括山东艺术学院副编审刘德卿对文杜里融批评、艺术史和美学三者为一的艺术批评观和批评方法的提示和探讨；也包括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张坚对由温克尔曼到沃尔夫林、李格尔的“德意志历史主义”与“美术通史”（一种体现内向、自足特点凸显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差别的研究方法）内在关系的提示和探讨。所有这些方法或许都是值得中国之外国美术研究借鉴的。在方法讨论中，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皮道坚特别强调了知识建构对外国美术研究学科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扩大“知识维度”，开展以前所忽视的外国美术理论和批评方面的研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平谈到了“反标签化”问题；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黎洵提出了如何对待艺术历史视野中的“前卫艺术”问题；青岛农业大学助教林承琳以对四幅作品的示范性解读，提示了贡布里希的“渊源分析”图式和布列逊的“转义分析”

方法各有的优点和局限……会议涉及方法讨论的内容很丰富，也很有启发意义。

关于外国美术史教学和学科建设这方面的讨论内容同样丰富，而且所论所谈都有教学实践的基础，都是值得重视的经验文本。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奚传绩的会议论文《一门不该被边缘化的课程》，详细而深入地探讨了有关教学方面的内容，比较有代表性。北京大学教授丁宁根据美术教育面临的新态势及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特别提出应该把西方美术史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结合美国今年推出H·W·詹森《艺术史》第7版之事，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行远讨论了撰写西方美术史教材所面临的范式“难题”——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涉及到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立场问题。青岛科技大学教授马延岳，青岛大学讲师董宇，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樊林，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平，中央美术学院讲师王云，云南艺术学院讲师陇艺梅、汤海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助教孙嫣，广西艺术学院助教朱丹红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教学问题做了有积极意义的探讨。

另外，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广元、张建军和张洪忠，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耿幼壮，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宋玉成，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孔笛，临沂师范学院讲师冉利强等提出的专题研究，让大家看到了外国美术研究方面的一些有价值的个案。《美术观察》副主编赵权利、学术推广部主任谷泉和“国际视野”栏目主持王红媛，在主持会议讨论的过程中发表了各自很好的意见和观点。

着眼于21世纪中国外国美术研究发展战略的本次会议，是2006年中国美术理论界的一次重大学术活动。与会代表围绕会议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有趋向共识之趋势的积极思想认识成果，同时也提出了诸多切实而又富于理论价值的问题。思想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不同思想认识构成的张力会有助于研究事业的推进和深化。本次会议时间虽短，但作为外国美术研究学术交流平台的首度搭建，意义非同寻常，希望这样的平台能持续保持。

吕品田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美术观察》主编

2006年12月于北京

全国外国美术研究与教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开幕词

吕品田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美术观察》杂志社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各新闻媒体和专业报刊的朋友们以及来自各院校的年轻的研究生朋友，表示欢迎和感谢。向我们的真诚的合作伙伴，为筹备和接待本次会议付出积极努力和作出巨大贡献的山东艺术学院表示感谢。

近代以来，中国美术史是在空前激烈、空前范围的中外文化碰撞中展开的。在这个历史中，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包括历史、理论和批评的研究，始终扮演着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是从翻译和介绍开始，并与之并行发展的。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的参与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美术目前的面貌，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恢宏的格局和多样化的形态。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我们的外国美术研究成果，有丰子恺的《西洋美术史》，陈之佛的《西洋美术概论》、《西洋绘画史话》，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等等；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有大量的关于苏联美术和苏联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介绍和翻译，比如说有倪焕之的《苏联的美术》，唐德鉴的《希腊雕刻简史》，常任侠的《中印艺术因缘》，还有像杨成寅翻译的《论艺术中的典型问题》、《艺术概论》等等，这样一大批的学术成果。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美术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外国美术研究对中国当代美术的一个促进作用，即打开国际视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就知道当年邵大箴先生在《美术研究》和《美术》上对西方现代派美术的一个系列介绍，还有像李浴的《西方美术史纲》，吴甲丰的《印象派的再认识》，常任侠的《印度与东南亚的美术发展史》，邵大箴的《欧洲绘画简史》，迟轲的《西方美术史话》，到后来还有朱伯雄主编的《世界美术史》（十卷本），晨朋主编的《20世纪外国美术丛书》，还有金维诺主编的《世界美术全集》（二十卷本）的恢宏巨著。像这样一大批的外国美术研究成果，对中国当代美术的推进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些成果，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窗口，国人也因此更大程度地了解了外国美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知道了中国传统美术格局之外的其他民族的艺术理想和实践经验。我们百年来的外国美术研究的成就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这些成果也带有体现历史条件的特定性或者说

局限性。比如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于20世纪以前的外国美术，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了解得比较多，也比较系统，对20世纪以来的了解就比较零散，或者比较片段。从地域分布角度来看，我们对西方的、欧美的美术了解比较多也比较熟悉，而对东方的，亚、非、拉的了解比较少而且比较生疏。从反映研究角度的成果形式来看，通史性的和介绍性的比较多，国别史和研究性的较少，概述性的比较多，专题性的比较少。从总体学术格局来看，有独立学术立场或者说中国学术立场的研究状态还没有充分地呈现，尚未走出编译状态。从总体价值取向来看，我们的学术判断和选择中还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的痕迹。我们说，体现历史条件的上述这些特定性或者说局限性已经为我们今天的外国美术研究圈出了相应的着力点或者说工作主题，更何况，我们需要一个与中国日趋强大、中国文化话语权日益增进之趋势相适应的外国美术研究形态和状态。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宏观发展目标都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面对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迫切需要在价值追求、思想立场、学术格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与时俱进的战略调整，并就学科发展实践进行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本次会议，拟汇合专业领域精英力量，针对中国的外国美术研究在新世纪的战略定位和实践对策等重大问题集思广益，谋求共识。因此，围绕着这个主旨，经过多方面的磋商和认真的考虑，我们提出了三个主要的议题。第一，21世纪中国之外国美术研究的战略目标和学术立场；第二，外国美术翻译和研究方法；第三，外国美术史教学和学科建设。以上是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山东艺术学院共同拟定的关于本次研讨会的一些设想。

在这里，我想再顺便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会议的缘起。最早，这个会议的动议是美术研究所的前任副所长王镛先生和我们美术研究所的外国美术研究室的王端廷先生提出的一个动议，要开这样一个全国的外国美术研讨会。那么，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后来我们也根据这样一个动议，《美术观察》杂志社出面和很多的艺术院校进行沟通、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黄河清先生、常宁生先生都在这里边积极地穿针引线，尤其是黄河清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很多院校，我们也曾经跟四川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分别联系过。但限于条件，这些我们都没有能够实现。那么，最后还是黄河清先生联系，给我们穿针引线联系到李丕宇和山东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凭着他们对于发展外国美术研究的这样一种战略眼光和雄厚的实力接纳了这一次会议，为我们今天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平台，一个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有关外国美术研究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的一个平台。我想，我们在举行这次会议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地感谢所有为这次会议作出努力和贡献的朋友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山东艺术学院的领导和各位老师以及为这次研讨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

吕品田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美术观察》主编

|| 外国美术研究的战略目标和学术立场

当前外国美术史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邵大箴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同仁：我首先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对这次召开的关于外国美术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会议，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研究教学方法等等议题，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次会议也是20世纪以来，在我国最盛大的一次外国美术史教学与理论研究的聚会，作为一个在外国美术史普及与教学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的老兵，感到非常高兴。

我想作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当前外国美术史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

我国高等美术学校中外国美术史教学与研究的水平不断地改进和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师资队伍不断扩大，不少教师在国外学习和进修过，许多教师有机会出国参观博物馆、观摩原作，教材编写也取得了成绩，这些进展都应该得到肯定。但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有下面几点，供同行们讨论参考，也是向大家求教。

第一，对外国美术史的教学和研究，学校的领导重视不够。在高等美术院校及其研究机构，对这方面的师资和研究人员的培养，领导都不十分重视，尤其在高等院校的实践类专业，普遍重视技艺教学，史论教育包括外国美术史的教育，常常是作为技艺教育的陪衬而设立的。另外，领导班子很少研究或根本不研究美术史论的教学和师资培养问题，外国美术史教学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外国美术史教学进展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外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内容上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的情况：重视西方美术史，忽视东方美术史，忽视亚、非、拉美术史。我们是亚洲国家，我们对近邻国家的古今美术史的研究非常不够，师资缺乏得可怜，教材寥寥无几，译著也极少，这是很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亟需改变。从中央美术学院来讲，办学这么多年，除了常任侠老师原来在20世纪80年代教过东方美术史以外，后来几乎就后继无人，没有正式的教东方美术史的人员。我们在美术史论队伍里面，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有两位是比较有名的，一位是在座的王镛先生，还有一位是已经过世的刘晓路先生，其他的当然还有一些年轻的刚开始走上工作岗位的，这跟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太不相称了。外国的专

家到中国来，包括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家到中国来，谈起东方美术的研究情况，我们感到很尴尬，非常难为情，可以说是无地自容。

第三，教授外国美术史的师资的文化素质需继续提高，教师教授外国美术史需要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和积累，需要有各方面的修养。比如要熟悉外国历史、文化、哲学、美学，要有较好的外文能力和较好的中文水平，此外还要懂得一些艺术创作实践的知识以及有艺术欣赏的眼光，等等。一个人具备这些条件需要长期的努力，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包括我在内。我们的许多青年教师对这一点似乎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第四，外国美术史的教材需要努力改进，国内已经出版的外国美术史教材的数量不少，但普遍质量不高。就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的《外国美术简史》教材来说，问题也不少，其中有的章节错误还不少，它由国家权威出版社出版，以讹传讹，害人不浅。其他教材，包括一些世界美术史中有关外国的几本，也有不少问题。学习美术史需要一本史料准确、图文并茂的教材，国家教委等有关方面应该重视这项工作，各个院校也应该加大鼓励力度，推进外国美术史的教材建设工作。

二

这次会议的内容还有外国美术研究这个课题，外国美术研究当然包括外国美术史、美术思潮、美术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当下的、流行的思潮的研究，这些都很重要。我想就研究这个问题，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要研究，必须要有资料，资料是第一位的；其次要有思想和观点，它们既要从研究对象资料中去挖掘去提炼，又要从普遍的经验中、普遍的思想和观念中，借用一些来分析和研究这些材料。有资料，有思想和方法就可以从事研究。现在的问题是，外国美术研究不论是史还是思潮，文献资料可以搜寻，实物难办，对原作研究无从做起，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刚才，吕品田先生对外国美术的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个要求当然是很好的，方向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中国从事外国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重点是做好介绍和普及工作，在介绍和普及中有点研究，有点中国人自己的看法就很好。当然，必须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看法，尤其对当代美术思潮。在座的不少老师都有自己的见解，这是非常好的。不过对这一点要求不要勉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对数以万计的中国观众做介绍外国美术的工作，这任务很光荣、很了不起。因此，我们要有平实的心态，不要怕别人说我们做的是普及工作。在写文章写书时，不要摆出一副吓人的研究家的架子。我们院校的领导在评定教师成绩、提升职称时，也需要对做外国美术研究的人员有实事求是的要求。我想说的是，在外国美术史方面，重点是普及。在普及里面有一点自己的看法，有一点研究的心得，这样就很好。对当代外国美术思潮研究少不了大量的文献，这也是我们当前外国美术

史教学和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献资料也不充分。很多人不安心做这个工作，感觉到我在中国做外国美术史研究，原作都看不到，怎么做研究呢？不能光靠不充足的文献，又不能到外国去，即使去，也时间很短，半个月、一个月，不能做认真的研究，所以不安心，怕写出来的东西水平不高。确实，即使做普及工作也需要读大量的书，参考外国专家们研究成果，能看到原作更好。不过我们还是要在现有条件下做好自己的工作。没出过国、学外语的，也能做好外国美术史的普及工作。最初，我们的许多知识很多是从外国著作中接受过来的。后来有很多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学习绘画、雕塑的前辈们，他们写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普及性文章，包括倪貽德、丰子恺、傅雷、常任侠，等等，他们做的大部分是普及性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过一本很不像样的普及性小册子，就是《西方美术史浅议》，是在“文革”后期参考了一些外文的书写的。当我拿着那本小册子在1982年到法国访问的时候，给熊秉明先生看，请他指教。熊秉明先生通篇读了那本小书，读完了以后又跟我讨论了几次。其中他有一段话使我很感动，他看到我这本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书印了8000册，非常感慨，他说他在巴黎写有关汉学的书，印几十本，最多印几百本（因为是用中文写的）。在国内8000本不算多，现在国内稍微好的书印几万本，几万本的书有几十万人看，几十万人从你这儿得到知识，得到知识和思想的启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对13亿人口中的几亿人口做这个工作，而且书在图书馆中，不断会有人看，这是非常光荣、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愉快地做好美术史的普及工作。美术史的普及工作，包括编美术史的教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我也很惭愧，我也写过一些书，发现其中有不少毛病，说明写作态度还不够严肃，花的工夫不够。所以我呼吁我们的同行们，要重视普及的工作，在普及工作里面有一点心得，一点体会，那就非常好。

三

还有译著问题。有位我尊敬的同行说，译书不能叫译著，什么叫译著啊，就是翻译嘛，怎么是著呢？其实译著当然是著，翻译是非常困难的，我非常尊重翻译的人，我自己也做过一些翻译。我翻译温克尔曼的一本论著，一共翻译了三年，每天晚上翻译。我的同行长者常又明先生说，他很少搞翻译，更很少去校对人家的稿子。他是搞英文的，是原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他说假如某某的译文一个词语或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可见它就是非常困难的，你校对时为了这个字、这个词语得花很多工夫，花三天、五天，查遍各种字典，都可能查不出来，翻译、校对都是困难的事。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翻译，翻译的稿费也非常少。我翻译的温克尔曼的书拿了1300元的稿费，那是1990年的事。可是，翻译非常重要，重要的外国美术史论方面的著作我们还是要翻译。但是现在翻译的人越来越少，这与我们始终不改变翻译的稿费，不改变报刊杂

志的稿费也有关系。在座的范景中老师，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我们对他们所做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表示十分感谢。当然，翻译、写书有错误、有缺点是难免的。50年代，傅雷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会的有不少国内名校的名教授，都是外语专家，傅雷先生在会上当场指出某某人在哪一本书上翻译错了，他把原文说一遍，指出错在什么地方，当场有人感到非常难为情，下不了台。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教授，很有名的翻译家。后来杨绛先生在《傅雷文集》的前言里说，傅雷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他的要求高了一些。她比喻说翻译著作和文章里面有错，就像是头发里面虱子似的，是捉不干净的。假如我们同行的译文中有些毛病，我们可以善意地提出，不要上纲太高。不过，作为译者或作者，要认真，不能马虎。吴甲丰先生说 he 老年的时候，翻译、写文章经常有一本《新华字典》放在旁边。我也有体会，写作时遇到文字问题要看看《新华字典》。至于翻译外文学学术著作，更要外文字典不离手。

我说的都是一些很琐碎的意见，目的是抛砖引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谢谢大家。

邵大箴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